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意味着什么

□ 吕红娟

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我们党正带领人民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形势环境变化之快、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对我们党治国理政考验之大前所未有。《中国共产党干部论坛》2020年第10期特别策划“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意味着什么”系列文章，特约专家学者撰文阐释。

如何全面理解和把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一级教授韩庆祥在《全方位理解和把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文中指出，统揽推进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四个伟大”实践，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治国理政的总体框架，这一总体框架有助于推进中国由“大国”迈向“强国”，有助于推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们要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历史使命置于“四个伟大”的框架中来理解和把握，只有如此，才能更好理解和把握这一历史使命的精髓要义。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上要谨防哪些风险或陷阱？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理事长靳诺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跨越“发展陷阱”》一文中指出，现在，我国正处于一个大有可为的历史机遇期，深刻认识我们面临的风险挑战，牢牢把握“变局”和“新局”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带来的重大机遇，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必然要求。面对困难、障碍、险滩和陷阱，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科学分析和理性应对。增强忧患意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执政为民，跨越“塔西佗陷阱”；文明交融，超越“修昔底德陷阱”。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什么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特聘教授杨金海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一文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给中国人民带来幸福安宁的正确道路。新中国成立7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的实践充分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完全正确的。这条道路极大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中华民族的面貌、中国人民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迎来了从创立、发展到完善的伟大飞跃；中国人民迎来了从温饱不足到小康富裕的伟大飞跃；中华民族正以崭新姿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无论遇到什么风浪都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什么必须进行伟大斗争？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教研部副主任董振华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进行伟大斗争》一文中指出，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要安不忘危、存不忘亡、乐不忘忧，时时刻刻保持一种伟大斗争的精神。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断奋斗的斗争史，我们正是依靠伟大斗争一步步走到了今天，也一定能够依靠伟大斗争战胜前进道路上的惊涛骇浪一步步走到明天。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必须进行伟大斗争；完成改革发展稳定艰巨繁重任务必须进行伟大斗争；抓住和用好面临的难得历史机遇必须进行伟大斗争；应对一系列现实的重大风险考验必须进行伟大斗争。

为什么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崇高历史使命？北京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韩振峰在《民族复兴：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崇高历史使命》一文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从成立那一天起就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自己为之不懈奋斗的历史使命，是有其内在根据和深层原因的，这既是党的根本性质和宗旨的内在要求，也是党的奋斗目标的必然要求。中国共产党只有为民族复兴大业奋斗才能发挥其两个“先锋队”作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必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如一的初心和使命。

如何辩证把握“两个大局”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北京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孙蚌珠在《在辩证把握“两个大局”中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文中指出，中国要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把自身发展放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一是保持战略定力和底线思维；二是埋头苦干，发展好自己；三是在全球变革中发挥积极作用；四是敢于和善于斗争，赢取主动。胸怀“两个大局”，既利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机遇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又通过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向发展。

名并用之制驭的人，这种对科学的敏感性来源于沈括见微知著、处处留心的思维习惯。

热爱群众的深厚情怀

沈括巡访淮南、河北西路，知延州，察水利、賑饥饉，多次深入百姓，体察民情，沈括曾言“至于技巧器械，大小尺寸，黑黄苍赤，岂能尽出于圣人！百工、群有司、市井田野之人，莫不预焉”。因此沈括十分重视从劳动群体的实践中汲取科学知识，《梦溪笔谈》对此多有记载，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对毕昇“活字印刷术”的记载，这是世界最早关于活字印刷的详细叙述，“活字印刷术”赖以传世。

沈括治学，一贯秉持“循其所同，察其所偏”的辩证思想。沈括关注科学知识的实用性，关注于对人民群众的服务。以群众需求的视野看待科学，这既是对自古“民贵君轻”民本位思想的继承，亦是体现以科学技术宽民惠民的举措。沈括在医学、天文、水利、物理方面的成就，多是以民众实际生产生活需要为首要考量。总而言之，沈括不囿世俗、勇于创新、细致缜密、求真务实的治学态度炳烁千古，深值我辈学习效仿！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进行文艺工作

——读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 储 峰

核心阅读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进行文艺工作的思想，重点强调了“文艺为什么人服务”和“如何服务”的问题，阐明了文艺是为人民服务的、文艺如何为人民群众服务以及在文艺工作中如何处理好普及与提高的关系等。这对我们党和国家的文艺工作的健康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文艺是为人民群众服务的

毛泽东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他认为，文艺是有阶级立场的，封建时代的文学艺术是为地主阶级服务的，资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现阶段的中国新文化，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是为人民的”，因此，“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

毛泽东认为，人民大众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模糊的概念，而是有具体的内在含义和特定对象，他指出，“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其中，工人是领导革命的阶级，农民是革命中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队伍是革命战争的主力，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是革命的同盟者。“我们的文艺，应该为着上面说的四种人。”在这里，毛泽东明确了“人民”的概念，从而划清了无产阶级文艺与资产阶级文艺服务对象的本质区别。

既然文艺要为“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这四种人服务，那么文艺工作者就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而不能站在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但实际上，一些文艺工作者在“为什么人的问题他们就还是没有解决，或者没有明确地解决”，因此未能真正做到以人民为中心进行文艺工作。在这一问题上，毛泽东着重批评了那些坚持个人主义的无产阶级立场的作家。他指出，这些人的兴趣，“主要是放在少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上面”，他们不去引导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去接近工农兵

群众，去参加工农兵群众的实际斗争，去表现工农兵群众；他们对于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寄予满腔的同情，“对于工农兵群众，则缺乏接近，缺乏了解，缺乏研究，缺乏知心朋友，不善于描写他们；倘若描写，也是衣服是劳动人民，面孔却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此，毛泽东明确指出，文艺工作者“一定要把立足点移过来”，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真正为工农兵的文艺，真正无产阶级的文艺”。

文艺如何为人民群众服务

毛泽东认为，文艺工作者只有解决好“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才能真正做到为人民服务，才能使文艺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

第一，了解熟悉工农兵群众。毛泽东指出：“既然文艺工作的对象是工农兵及其干部，就发生一个了解他们熟悉他们的问题。”在这方面，文艺工作者需要做很多工作，但了解、熟悉工农兵群众“是第一位的工作”，不了解、熟悉工农兵群众，就谈不上为人民进行创作。在这其中，他反复强调文艺工作者要解决好与人民群众的感情问题，“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要和群众打成一片，要“经过长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练”，使“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如果不解决这一问题，就难以真正做到“完全”“彻底”地为为人民服务。

第二，到工农兵群众中去。毛泽东认为，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

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反映的产物。人民生活是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源泉”。因此，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材料”，“只有代表群众才能教育群众，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唯有如此，文艺工作者创作出的作品才能深得工农兵群众的喜欢。

第三，帮助工农兵群众推动历史前进。毛泽东认为，人类的社会生活虽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虽比文学艺术有“不可比拟的生动丰富的内容”，但是人民还是满足于前者而要求后者。这主要是因为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据此，毛泽东指出：“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要通过文学作品或艺术作品，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

处理好普及与提高的关系

在文艺如何为人民服务这一问题上，毛泽东特别强调要处理好普及与提高的关系。他指出，只有从工农兵群众的立场出发，对于普及与提高才能有正确的了解，才能找到普及与提

目睹其验 始著于篇

——沈括的治学之道

□ 黄少雄

的累赘，旧历法给民众带来不便。沈括通过观察日月运行的规律，结合社会大众实际生活的需要，提出“十二气历”这一新历法。新历法以立春为一年首日，每月两个节气，大月份三十一日，小月份三十日，“岁岁齐尽，永无闰余”。这样历法与节气匹配，既合于日月运行规律，亦利于实际需要。沈括试图改变旧有传统，在当时可谓惊世骇俗，沈括自知必定免不了反对者的猛烈抨击，“今此历论，尤当取怪怨攻骂”，然其坚信该历法更经得起检验，“异时必有用予之说者”。

见微知著的治学思维

沈括虽博学，但对学问绝不是草草而行，敷衍了事，“必稍删其多歧，专心致意，毕力于其事”，由细微处入

物，不应拘泥于一定的时间，而应以药用部位成熟时月及产地决定采集时间。沈括认为诊病问药不应固守医书，而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医之为术，苟非得之于心，而恃书以为用者，未见能臻其妙”。秉持这一观念，沈括常对医学经典持理性的怀疑态度，必定要亲自验证，以实践进行检验后方信为真。

沈括治学虽不迷信常法，但对经籍密推算、切实有利于生产实践的科研成果坚决捍卫，甚至勇于挑战权威。宋时的历法“凡日一出没谓之‘一日’，月一盈亏谓之‘一月’”。但由于日月的运行并非完全契合，因此需设置闰月来平衡，“加一月谓之‘闰’”。然而不仅闰月生于不得已，更使朔望与节气不符，四季失位。宋时民众生产生活皆依照节气来调节，时月与节气不一致，再加上计算闰月

剂的医方。沈括亦精于地理，曾奉旨绘制《守令图》，其间遍览群书，亦多方实地考察，五易其稿，凡十二载方绘制完成。

注重实践的治学品质

沈括治学注重实践，其搜集医方，必辨明真伪，考验成效，“必目睹其验，始著于篇”。若是道听途说的医方，“闻不预也”。所著《苏沈良方》均附有临床验证，可信度高。以往世俗采药，多在二月、八月采，但此并非实事求是的科学采集方法。沈括在《梦溪笔谈·药议》论述道：“古法采草药多用二月、八月，此殊未当。但二月草已芽，八月苗未枯，采掇者易辨识耳，在药则未为良时。”采集药

沈括（公元1031—1095年），字存中，北宋政治家、科学家。沈括一生著作颇丰，博学多才，尤其在科学领域卓有成就。据《宋史·卷三三一》记载：“括博学善文，于天文、方志、律历、音乐、医药、卜算，无所不通，皆有所论著。”英国著名科学史学家李约瑟称赞其为“中国整部科学史中最卓越的人物”，称赞其代表作《梦溪笔谈》为“中国科学史上的里程碑”。沈括在科学领域的成就得益于沈括本人持之以恒、注重实践、见微知著的治学态度和热爱群众的深厚情怀。

持之以恒的治学态度

沈括治学不辞辛苦，持之以恒，少年时常夜书小字，染上眼疾，病目楚痛，后得一良方得以痊愈。沈家本就重视岐黄之术，家传有《博济方》，自此之后，沈括更与医学结下不解之缘。沈括研究医学非常注重对医方的搜集，自称“予治方最久”。沈括搜集医方数十年如一日，常亲至街头巷尾、村野山林，“凡所至之处，莫不询究，或医师，或里巷，或小人，以至士大夫之家，山林隐者，无不求访。及一药一术，皆至诚恳切而得之”。并著有《苏沈良方》，其中所载“秋石方”是世界上最早记载配制荷尔蒙制

